

汉学大系丛书——朱存明主编

# 器物图像与汉代信仰

练春海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器物图像与汉代信仰

练春海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Copyright©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器物图像与汉代信仰 / 练春海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12

ISBN 978-7-108-05136-3

I. ①器… II. ①练… III. ①古器物—图象—关系—信仰—研究—中国—汉代 IV. ①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76078 号

责任编辑 罗 康

封面设计 储 平

责任印制 黄雪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排 版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张 19.75

字 数 310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 《汉学大系》总序

世界总是在不断地变化。历史上,有些文明消失了,有些文明则不断壮大,以至于形成现代世界的格局。进入21世纪,世界格局面临一个新的调整,美国人塞缪尔·亨廷顿写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认为不同文明的冲突将导致未来社会的对抗。这个观点值得警惕,也值得研究。做好中国自己的事、勇敢面临挑战,是我们面临的任务。

中国文明发展了几千年,历史上曾经有过自己的辉煌,但是清朝后期,由于没有科学民主的现代理念,曾经落后挨打,令多少志士仁人痛心疾首。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一个甲子年的现代发展,中国又迎来了一个快速崛起的历史新时期。

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发展,一方面要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要不断回溯历史,在历史的记忆中寻求民族之根。当今世界的寻根与怀旧实际上都有现实的基础,它是民族凝聚力的根源。在回溯历史的新的阐释中,一个新的历史轴心期即将来临。

我们编纂《汉学大系》丛书,就是为了探求中华文化的历史起源、学术源流、基因谱系、思维模式、道德价值等,为实现中华文化的历史复兴奠定基础。

“汉学”,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因时间与空间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究其变化之因,皆因对“汉”字的理解与运用不同所致。“汉”字既可指汉代,也可指汉族,还可以作为中华民族的代称。“汉文化”可以指两汉文化,也可以指代中国传统文化。所以“汉学”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内涵:可以指两汉的学术文化,可以指清代的汉学流派,也可以指中国及海外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具体来看,汉学研究范

国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引证取材多集于两汉。“汉学”一词在南宋就已出现,专指两汉时期的学术思想。清朝汉学有复兴之势,江藩著《汉学师承记》,自居为汉学宗传。汉学又称“朴学”,意为朴质之学。“朴学”重考据,推崇汉儒朴实学风,反对宋儒空谈义理,也被称为“汉学”。现代“汉学”或称作“中国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或称“海外汉学”,是国外的学者对有关中国方方面面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提出清代汉学的复兴是对当时理学思潮的反动,其学术动力就是来源于复汉学之古;钱穆在《清儒学案》中认为,汉学的兴起是继承与发展传统的结果;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等著作中认为,清代汉学思想的发展动力是“早期启蒙思想”。

在国外汉学的经典名称为“汉学”(Sinology),有的称为“中国学”(Chinese Studies)。“汉学”(Sinology)或“中国学”(Chinese Studies)是国外研究中国的学术总称,它们具有跨学科、跨文化的特征,反映了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变化及学术发展趋势。

在西方,主要是欧洲,严格意义上的汉学研究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这一学科的形成,表明了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从汉学发展的历史和研究成果看,其研究对象不仅仅是中国汉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实际上是研究包括中国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整个中国的学问。由于汉民族是中国的主体,而且汉学最初发轫于汉语文领域,因而学术界一直将汉学的名称沿用下来。汉学只是一个命名方式,丝毫没有轻视中国其他民族的含义。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西方汉学已经形成三大地域,就是美国汉学、欧洲汉学、东亚汉学。

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国内外汉学的研究,又形成了一个热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学术界需要发出自己的呼声,海外汉学与中国本土学术进行跨文化对话,才能洞悉中国文化的深层奥秘;中国学人向世界敞开自己,才能进一步激活古老的传统和思想的底蕴。

因此,汉学是继承先秦诸子文化在汉代统一性国家建立基础上形成的中华民族的学术。“汉学”的研究中心是以中华民族统一性的价值观为主体,以汉语言为基础,以汉字为符号载体的文化共同体。汉文化是在融合了不同民族、不同区域文化而形成的一个文化统一体。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这个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印度佛教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有着不同的发展模式与价值体系。“汉学”作

为中国传统学术流派的称谓,常常与“国学”“经学”相混,也有人赋予“汉学”以新内涵,将国内的中国学研究也称为“汉学”,这可以称之为“新汉学”。汉民族是历史上多民族长期交流融合的结果,历史上形成的汉语、汉字及其独特的汉文化,对中国文明以至世界文明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汉学就是对建立在汉语、汉字、汉文化基础之上的中华民族的学术传统的学理性探讨。

中华文化在历史上就对世界产生过影响,中外文化交流一直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16世纪以来,中华文化进一步引起西方的注意,西方“汉学”研究也随之兴起。西方人对于汉学的研究是基于他们的文化立场的,对中国汉学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也有一些误读。目前,时代赋予了我们新的历史使命,本课题就是基于目前中国的现实需要对中国“汉学”学术内涵进行的基础研究。

由于历史原因,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汉学在国外得到研究,国内研究反而滞后,国内外有些研究机构把汉学的概念仅仅看成外国人对中国学的研究,这无疑缩小了汉学的视域。西方有些国家从自身战略利益出发,正在通过各种渠道争夺中国的学术资源。今天我们有责任对民族文化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打下深刻的话语基础。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的基础,保护民族文化基因就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

《汉学大系》的编纂会促进汉学的历史回归,这既是对汉学内涵的理论建构,也是对汉文化研究成果的学术汇编;既是对“国学”基因谱系的深度描述与重新阐释,也是对国外汉学研究历史的重新定位,更是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进行的一次新的发掘。

目前中国的发展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过去我们大量翻译了西方的学术著作,促进了中国对国外的了解,也给新中国的建设奠定了基础。但是长期以来,由于革命的需要,我们对传统文化否定破坏的多,肯定继承的少,中国传统学术在西学的影响下逐渐式微,现在中国面临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就像西方的文艺复兴时代回归古希腊罗马文明一样,中国新的历史复兴将在恢复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指向科学民主繁荣昌盛的未来。

《汉学大系》是汉文化的学术成果的集约创新,既是对“汉学”内容的研究,又是对“汉学”内容的确定。既有深入的学术探讨,又有普泛性的知识体系。既有现代性的学科划分与学术视野,又有现代性的学术理念与学术规范。恢复汉代经学的原典传统,并对经典进行现代性的阐释,从经学原著中深入挖掘对现代社会普遍有

效的思想资源,明确中国汉学的智慧传统,为中国文化的复兴寻找历史的深度。以汉代汉学为正统,以清代朴学与海外汉学为两翼,深入探讨汉文化之源。

本丛书对汉学的内涵进行了发掘、整理、探讨。汉学历史的考据与研究同步进行;经典阐释与主题研究并重;历史的考据与新出土文物的相互发明;古典文献与出土简牍对应解读。以汉代的现实生活与原典为基础,兼及汉代以后的发展,参以国外汉学的不同阐释,通过比较来探讨汉学的真正内涵,寻求中华文化的话语模式,进而形成自己的话语权。发掘中国的智慧,促进新观念的变革,促进社会进步,实现大同世界的美梦。

朱存明

2014年7月8日

## 物质文化与汉代信仰(代序)

黄厚明

在中国历史上,汉代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代。周代以来,随着新的天命观的出台,人神关系在全新的社会语境中不断被重新定义,从而演绎出汉代复杂多元的信仰体系。作为这一时期重要的思想流派,儒释道的滥觞所代表的不同信仰体系在两汉渐次形成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其后中国文化的性格和面貌。

关于汉代的观念和信仰问题,传统的研究者通常借助于经典文本来梳理、研究其演变脉络。这种研究强调精英思想在信仰体系中的巨链作用,并以此为线索讨论一种信仰的起源以及不同信仰间冲突与融合的进程。20世纪后期,包括信仰在内的思想史议题逐渐从研究历史规律论转向历史认识论。这种理论范式的转型,不仅更新了思想史的书写方式,而且也拓展了思想史的问题意识和研究内容,其情形正如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导言中所描述的那样:“思想史已经从‘注意中心’到‘注意边缘’,从‘注意经典’到‘注意一般’,从‘注意精英思想’到‘注意生活观念’。”对于研究汉代思想和信仰的学者们而言,其关注的焦点已不仅仅局限于对信仰结构和内容的探究,而是要更进一步追问这种信仰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和文化空间中被构建起来的;而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通过多样化的物质文化研究重建汉代的社会环境、知识背景和文化语境。练春海博士新著《器物图像与汉代信仰》,正是从这种学术理念出发所作的有益尝试。

从器物图像的角度研究信仰或思想,其合理性在于:器物图像既是特定信仰和

思想的产物,同时又是维系这种信仰和思想的因素。这种正反相承相合的关系,既为该书论题的展开提供了充足的言说空间,同时也给课题的论证埋设了种种可能的困难甚至陷阱。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并没有将考古出土的材料一股脑地纳入到课题讨论中,而是有意识地选择了包括博山熏炉、天梯、铜镜、铺首、玉璧、兵器、神鼎、玉胜等八种汉代器物与图像进行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这些材料全都来自于墓葬,并被视为墓葬环境的一部分而加以研究。

盛行厚葬之风的汉代,墓葬文化异常发达,这为我们研究汉代的信仰状况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文化遗存。但是,如何让这些静态的资料复活,成为言说汉代信仰状况的可信资源?本书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始终以一种功能主义的认知眼光看待这些物质文化遗存,将其视为理解、制造、使用、废弃它们的“人”的一种手段。这种“以物见人”的研究思路,使具象的物质遗存与抽象的观念信仰之间通过“人”这一纽带而联结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器物图像与汉代信仰》第一章导论部分,作者通过“物”、“像”、“场”三个关键词梳理、阐述这种关系。按照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墓葬是人类信仰的产物,对死者而言,随葬品自然也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这些有意义的器物图像的背后,藏住着一个令今天观者无法直接感知的丰富隐语系统。为了尽可能地揭示历史的真相,春海博士并没有承袭既有俗套,对这些物质遗存作简单的考古类型学分析,而是首先通过先秦两汉时期文献所提供的蛛丝马迹追溯器物图像的名实关系。这种做法值得称道。器物图像的命名分类,通常有“自名”和“它名”两种方法。“自名”就是按照当事人的命名称呼器物;“它名”则是后人根据自己的认知和判断称呼器物。一般而言,研究器物图像的功能和内涵,需要以“自名”原则为前提,只有这样才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古人的认识。书中关于“生器”、“明器”、“祭器”等概念的分类与讨论,都遵循了这一原则。值得一提的是,在讨论“像”这一概念时,作者将它视为“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作者看来,所谓“像”,即“物”的图绘呈现,这种分类方法将功能论和系统论融为一炉,为作者其后的论述奠定了逻辑前提和理论先导。根据这一独特的观察维度,作者敏感地注意到器物图像在墓葬中独特的配位原则和组合关系。作为行为入主动设计的结果,这些配位原则和组合关系无疑蕴含了特定的观念和信仰内涵。与这一逻辑推演相一致,墓葬同样被视为一个有秩序的信仰空间,在这个观念场域中,墓葬中物、像的安排和内部空间经营不仅有规律可循,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文化整体。诚如作者所指出的一样,汉代墓葬中不同位置上的壁画、画像石、画像砖的图案安排都是作

为整体考虑和设计的。只有重现墓葬中各种关系“场”，才能找到解读图像意涵的可能管道。

在遵循这种整体读法的基础上,该书其后的八章分别以八个独立的个案展开。对某一类器物或图像的研究,学界早先多着力于器物图像本身的形式或母题研究,后来又逐渐意识到这种研究的局限性,转而从单纯的图像解读到开始关注图像制作原境的历史重构。不过,在这个转向的过程中,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图像形式和母题的研究如何与图像制作语境进行有效的关联?两者的关联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两者的研究是互为前提的。事实上,如果不清楚图像形式和母题的来龙去脉,构成图像制作原境的各种关系场就会被遮蔽;同样,如果不去重构图像的历史原境,不在特定语境中解读图像的形式渊源和文化原型,研究者也就无法真正理解图像的前世今生。从这个角度上讲,本书对器物图像的重新关注,在方法论上具有启迪意义。以第二章博山熏炉图像研究为例,作者依靠考古实物和文献资料,首先讨论了汉代熏炉、博山熏炉的名实、形制、来源、谱系、使用人群诸多问题。在此基础上,又分别检讨作为“物”的博山炉和作为“像”的博山炉在墓葬中的配位原则和组合关系。作者注意到,作为“像”的博山炉在墓葬语境中有其独特的呈现方式:一方面,图像化的博山炉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该类图像主要见于陕北东汉画像石墓中,在墓葬中的位置也非常固定;另一方面,作为图像化的博山炉,除了造型上模仿青铜博山炉之外,它们还通过在图像中加入其他符号,利用符号的组合与交织等方式创造出新的图像语汇。作者指出:图像化的博山炉与作为器物的博山炉在功能上并不对等,作为器物的博山炉通常使用于权贵阶层的墓葬,普通墓葬无迹可寻;而图像化的博山炉则摆脱了这种限制,成为所有人表达思想、观念、信仰的现实工具。进而言之,“像”与“物”的关联以及两者在功能上的分离,不仅为研究汉代物质遗存增添了新的维度,而且也使汉墓从死者居所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信仰空间。

作者对物、像关系的认知以及对相关细节的独到观察,在其后的七个专题研究中也都有得体的表述。如书中对铜镜的研究,作者通过对“阳遂”相关的实物、图像和文字的考证,不仅有效澄清了以往研究者将阳遂视为工匠名字的误判,而且论及了作为实物、图像和文字三种形式存在的“阳遂”在墓葬语境中的不同功用。又如,作者对汉代墓葬所谓“丹鼎图”、“弓矢图”等图像的辨正与释读,都不乏真知灼见。当然,一种新知、新见的提出,在理论上都是一种假说。作为专门研究观念史的一本

专著,该书的论述不论是大胆抑或保守,读者诸君自有公论。这里,我更想从方法论的角度谈谈自己的读后印象。我注意到,书中论及的许多观点虽然与传统说法不同,但它们与旧说始终有比较充分的学术对话。这种有破有立、破立结合的论证方法,充分体现了作者求实务真而不唯标新的治学态度。在研究器物与图像时,作者充分考虑到时间和空间因素在其中的隐性作用。在时间因素上,无论是器物、图像还是墓葬本身,作者皆以长时段眼光审视其形式、母题、形制等结构的由来与演变,并以墓葬为中心所构建的一个有机文化丛林中探讨其成因;在此基础上,又将空间维度织入其间,讨论共时性结构下物质文化遗存的呈现方式以及这种呈现方式背后可能的观念信仰。在这种由时间、空间编织的错综复杂的多维网络系统中,作者不仅能从以往学者不太关注的一些细节中发现解读图像意义的线索,更重要的是让他对图像的意义持有一种历史化和区域化的认知眼光。比如,作者认为有些器物图像的意义则完全取决于它所出现的地区。这种对问题情境的强调,往往正是解读图像的关键所在。值得一提的是,该书讨论的焦点虽然是器物与图像,但书中对文献的使用也特别重视,并且,对文献和图像在历史研究中的不同功用有清醒的认知。相较于上古先秦,汉代可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备图像与文字互证条件的时期。如对器物、图像的名实考证,作者就充分利用了同期文献这一便利条件。强调器物自名原则和对同期文献的使用,背后有一个重要的学术关怀:文献如同图像,在不同时期也可能隐含了不同的观念表达。研究者使用文献时,同样需要对文献的性格有得体的把握。比如,先秦两汉人们对“天”、“神”、“鬼”、“仙”的理解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可能随着观念和信仰的变迁而被赋予不同的意义,这就需要对文献的内在脉络进行历时性的梳理;同样,在儒释道不同信仰体系中,这些概念也可能被演绎成不同的文化符号。两者在历时性和共时性结构中构成的经纬关系,如果分寸感把握不当,结论就会谬以千里。

春海博士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汉代艺术与考古的研究,心无旁骛。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他在朱青生教授门下研习汉画,并以汉代御礼为题完成了学业论文。不久,即以《汉代车马形像研究:以御礼为中心》付梓出版。在马车御礼研究的基础上,春海博士又将研究的课题进一步扩展到汉代其他器物。《器物图像与汉代信仰》的面世,正是他在汉画研究领域又一部重要的姊妹成果。相信此书的出版,将有助于拓展汉画研究的新面向。

## 目 录

|                    |    |
|--------------------|----|
| 第一章 导论：物、像与场 ..... | 1  |
| 一、墓室中的器物 .....     | 4  |
| 二、器物图像 .....       | 8  |
| 三、图像的在场 .....      | 14 |
| 第二章 熏炉图像 .....     | 31 |
| 一、博山熏炉 .....       | 33 |
| 二、皇家背景 .....       | 36 |
| 三、博山饰 .....        | 41 |
| （一）植物属性 .....      | 44 |
| （二）龙纹符号 .....      | 47 |
| 四、熏炉变体 .....       | 52 |
| 五、图像熏炉 .....       | 57 |
| 第三章 桌形物像 .....     | 67 |
| 一、通天之树 .....       | 72 |
| 二、通天之山 .....       | 75 |
| 三、图像天梯 .....       | 77 |
| （一）天梯组合 .....      | 81 |

|                 |     |
|-----------------|-----|
| (二) 天梯类型 .....  | 89  |
| 四、天梯的延伸 .....   | 94  |
| 第四章 铜镜图文 .....  | 100 |
| 一、出土阳遂 .....    | 101 |
| 二、礼器阳遂 .....    | 111 |
| 三、遂鉴合一 .....    | 117 |
| 四、铜镜功用 .....    | 120 |
| 第五章 铺首图像 .....  | 127 |
| 一、铺首滥觞 .....    | 133 |
| 二、铺首形制演变 .....  | 137 |
| 三、实物铺首功能 .....  | 142 |
| 四、图像铺首 .....    | 150 |
| (一) 图像的创造 ..... | 152 |
| (二) 符号的粘连 ..... | 156 |
| 第六章 玉璧图像 .....  | 164 |
| 一、玄璧敛葬 .....    | 165 |
| 二、天门半开 .....    | 173 |
| 三、结草衔环 .....    | 181 |
| 四、世俗变体 .....    | 185 |
| 第七章 兵器图像 .....  | 189 |
| 一、武库兰锜 .....    | 189 |
| 二、蚩尤五兵 .....    | 195 |
| 三、悬弧之庆 .....    | 199 |
| 第八章 神鼎图像 .....  | 203 |
| 一、铸鼎象物 .....    | 204 |

|                |     |
|----------------|-----|
| 二、泗水升鼎 .....   | 207 |
| 三、启鼎取丹 .....   | 211 |
| 第九章 胜纹图像 ..... | 217 |
| 一、造型起源 .....   | 218 |
| 二、实物遗存 .....   | 221 |
| (一) 金胜饰 .....  | 222 |
| (二) 司南珮 .....  | 223 |
| (三) 玉座屏 .....  | 225 |
| 三、图像遗存 .....   | 226 |
| 结论：器物与信仰 ..... | 231 |
| 一、事死如生 .....   | 231 |
| 二、器以载道 .....   | 236 |
| 三、超越图像 .....   | 242 |
| 图片说明及出处 .....  | 245 |
| 参考文献 .....     | 278 |
| 后记 .....       | 303 |

## 第一章 导论:物、像与场

古代墓葬通常伴随着器物出土,即使是原始时期的墓葬亦是如此。上古时期,普通人死后通常只有为数不多的器物作为随葬品,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来看,这些器物一般是对死者而言极为特殊的事物,否则都应该遗留给族人作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继续发挥作用。进入信史时代,随着物质生产和攫取生活资料能力的提高,人们拥有或可以控制的物质生活资料越来越丰富,在死者下葬之时,随葬的物品也日渐增多。随葬它们的理由也开始多样化,或者因为死者生前的喜好,或者因为死者的逝去器物已丧失了存在的价值,或者因为忌讳,诸如此类的理由以及器物在墓葬中的使用方式、功能等,汇聚成丧葬中器物的文化和信仰。

具体到墓葬,我们先举一个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墓葬的例子。在 M433 墓葬中出土了陶壶、陶壶、串珠各一件,石板两块;而在墓 M472 中,仅见陶盆、陶纺轮各一件,彩陶壶两件(图 1-1)。M433 墓所出的串珠可能是死者随身佩戴的饰品,从尸体摆放的姿势和它与石板的关系来看,石板很可能是用来“镇压”死者的;M472 墓中的陶纺轮可能是与死者身份关系密切的一种物品。这两座墓葬比较特殊的地方在于,墓坑底部靠近足端处又往下挖了一个方形或长方形的小坑,内置一至两件陶制容器。半山类型的墓葬共有二百五十七座,即使是其中随葬品最丰富的一座,我们也只发现彩陶壶、彩陶罐、盆等陶容器七件,石臂饰一件,绿松石饰三件,骨镞二件,骨片九十二枚,串珠六百五十颗。<sup>①</sup> 这个掌握武力而且实行了二次葬的墓主人在世时的地位显然非同寻常,但所随葬的物品数量不过如此。到了商周时期,虽然随葬物品略有增加,但大抵还处于一个比较低的层次。2005 年 6 月,安徽蚌埠市双

---

<sup>①</sup>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年版,第 11—13 页。

墩有一座春秋时期的墓葬被盗未遂,考古人员随即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铜器、石器、玉器等 400 多件。据发掘者推断,墓主可能是春秋时期淮河中游地区钟离方国的国君;<sup>①</sup>2003 年在河南省平顶山市西滢阳岭偏东的缓坡上发掘了一座战国墓,墓葬保存完好,出土了随葬礼器总计 18 件,就材质而言,有仿铜陶器和玉器,由此可以判断墓主人为没落的贵族。<sup>②</sup>上层社会尚且如此,遑论平民百姓了。这种情况到了秦汉时期,尤其是西汉中期以后开始有了较大的改观。由于厚葬之风的盛行,随葬器物不再囿于礼器,日常用器如仓、灶之属开始大量出现,堆满墓室,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器物的种类日益丰富,到了东汉更是连各种家禽、家畜的模型也一应俱全。例如在近年发现的张安世家族墓地中,我们甚至在其中一座墓(M1)的耳室中发现了品类齐全的“食品”被完整地保存在 11 件编织盛器和 1 件大型彩绘漆器中(图 1-2)。在一座完整的侯王级墓葬,如广州南越王赵昧墓,所出土的各种器物更是堆积如山,累计超过 12 000 件之多。<sup>③</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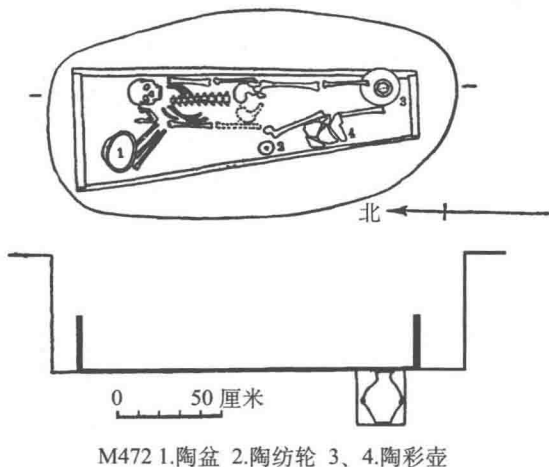


图 1-1 马家窑半山类型墓 M472 平、剖面图

- ①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安徽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 年 3 期,第 4—18 页及彩版。
- 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局:《平顶山应国墓地两座战国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07 年 4 期,第 20—27 页。
- ③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年版,第 414—528 页。



图 1-2 用高科技成像手段获得的随葬品影像

汉代许多墓葬所出土的器物,往往生器、明器、祭器一应俱全,这些器物所荷载的汉代丧葬观念既有“视死如生”、“不死升仙”者,也有“死生异路”者。当然,这些器物相互之间既有矛盾的一面,也有同质的一面,如器物形态的买地券、铅人、玉蝉等,都具有或者被想像成具有“实用性”或“可用性”,尽管它们的实用特征受不同的观念所塑造,但在形态上都表现为实在的物体。西汉中后期伊始,我们发现墓室中最为丰富的对象(器物)有从实体形态向图像形态迁移的情形。与器物之“适用”相对应,图像本应与“叙事”相对应,为情节服务,但器物的图像不同于情节性画像中的道具,它们原则上不为图像(或图像组合)的叙事服务。它们作为图像中的主体出现,是意义的承载者,而不是其他叙事结构的辅助元素。这类图像的绘制可能出于一些比较特殊的需要,例如受制于礼制的约束,或者经济条件的限制,墓主(或赞助人)尽管在墓葬中随葬有某些器物(包括它们的明器形式)的诉求,但却无法实现,最终赞助人选择图绘的方式“随葬”了那些器物。以一件河南出土汉代画像残砖上的图像为例(图 1-3),从砖上的残留图像来看,画面分为上下两栏,上栏为执笏跪坐人物与耳杯间隔排列,下栏为带铺首衔环的铜壶与三足陶奁等器物间隔排列。若说上栏的耳杯可能为人物之间的点缀,那么下栏的铜壶肯定是作为主体图



图 1-3 执笏小吏·铜壶